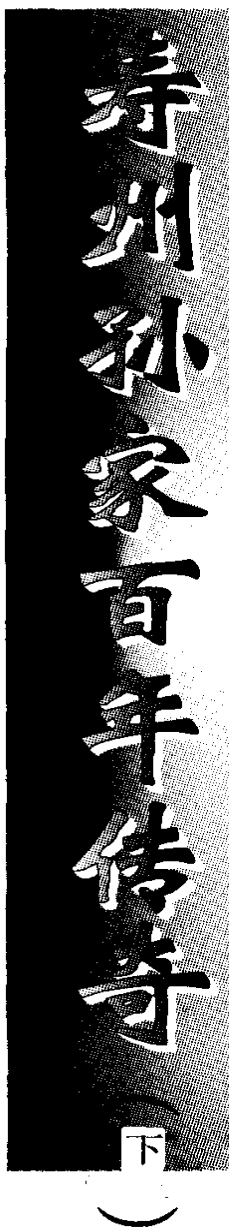


孙多禔“戏弄” 梅兰芳

孙多禔行三，人称“孙三爷”，生性喜欢开玩笑，为此得罪过不少人，但他是孙家大少爷，人家也拿他没办法。他早年家住北京时因喜爱京剧，与梅兰芳熟悉，梅兰芳称其“三老爷子”。两人都移家上海后，时有来往，有时还同台演戏。

有一年内地发大水，上海演艺界纷纷举行义演救济灾民。梅兰芳决定在兰心大戏院上演《苏三起解》，要孙三爷当个配角小花脸，出饰押解苏三的狱卒。演出

哥和你那六哥哥呀！”嘴里说着，手还顺势往台下一指，台下顿时哄堂大笑。而此时冯六爷（冯耿光）正坐在台下第三排看戏，玩笑开到了他身上，自然有些坐不住了。巧的是他的身边正坐着孙多禔的堂兄孙多巘，于是就对孙多巘说：“他……他怎么



□ 晓 颂

开始后，两个人一搭一档，一老一少，唱得挺来劲。谁知这个孙三爷生来爱捉弄人，过去在台上演出时就喜欢别出心裁，于剧本台词之外，随意来点即兴发挥。这天演到节骨眼上，他那即兴发挥的毛病又来了。苏三叫狱卒顺便问问过路的人，有没有从南京来的，有没有在南京看到过王金宝的人，这时狱卒有几句对白，原本应该说：“苏三呀苏三，你可真有良心呵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（指身陷牢狱里），还惦记着你那三哥哥！”可是台词到了孙多禔的嘴里，就变成了“还惦记着你那三哥

这么说？他下面还要说什么？”孙多巘也是孙家大少爷，平时谁的账都不卖，顿时冲着冯说：“他说什么，我怎么知道？！”弄得冯六爷好一阵尴尬。台上的梅兰芳也知道孙的脾性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心里毕竟有些不快。

多情才女孙多慈

孙氏家族还不乏艺术人才——孙仰农和孙瑞方（蕙仁）是名票，一个在上海，一个在北京，都常粉墨登场。孙瑞方是中国实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，又是余叔岩的帐房，与余叔岩及其班底的人都烂熟。孙多诠（筱斋）是诗人、书法家，他1925年哀悼孙中山先生的挽联被誉为海内名联：“路改中山、园改中山、城县改中山，中山不死；名满天下、政满天下、哀悼满天下，天下一人。”他那嘲讽某军阀的诗曰：“毛腿居然占大羹，沙沙舞爪叹轻生。局依聊举乾坤手，天下哪容你横行！”因形象鲜明、辛辣痛快而传遍天下。寿州县城内原春华医院（县医院前身）内“善与人同”蓝底金字匾额，即是他的手笔。他初崇二王，后学颜柳，晚年近何子贞，留传下来的墨迹已极少见了。孙鯤方（又名司徒越）则是当代安徽著名的书法家，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分会名誉主席，还担任了安徽省考古学会和博物馆学会的理事，寿县政协副主席，安徽省第六、七届人大代表。他1933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，1938年在郭沫若领导下做抗日宣传工作，解放以后在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。他的书法正、草、隶、篆兼长，尤以狂草饮誉书



才女孙多慈

坛，作品曾被送往日本等国参加展出，中央电视台和安徽电视台曾多次播放《司徒越的狂草艺术》专题片。不过，孙家的艺术人才中，最具才情的还属女画家孙多慈。

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（养癯），曾任大学教授、教务长，还曾是孙传芳的秘书、国民党安徽省常委，其母汤氏是某女校校长。孙多慈姐弟3人，她是老大，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，17岁时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。

1930年9月，孙多慈赴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充旁听生。时值著名画家徐悲鸿出任美术系主任，常亲自授课，孙多慈遂成为徐悲鸿的学生。徐悲鸿很快发现了孙多慈与众不同的才华和悟性，认为如此出众的女学生实不多见，就格外用心地培养她，时常在课余约她来画室观摩，并为她个人画像。谁知日子一长，一场痛苦的“师生恋”就拉开了帷幕。徐悲鸿那时的太太蒋碧薇闻讯后大发雷霆，一方面在家里向徐悲鸿发难，另一方面指使人对孙多慈进行人身攻击，不是把她的名字写在黑板上，加上不堪入目的秽语加以诋毁，就是用刀把孙的画作捅破，并恫吓她：“我将像对付这张画一样对付你！”

1931年7月，孙多慈以第一名的成绩正式考取了中央大学美术系。在以后的4年里，虽然徐悲鸿很少在南京逗留，但蒋碧薇还是紧盯着她不放。孙多慈只能百般忍耐，这就越使徐悲鸿的感情天平向孙多慈倾斜。徐悲鸿曾画了一幅《台城夜月》图，把他和孙多慈都画入其中了，两个人一个席地而坐，一个倚立一旁，洁白的纱巾随风飘动，天边正高悬着一轮皓月。可惜这幅画被蒋碧薇发现后毁了。在孙多慈完成大学学业时，徐悲鸿原打算带领全班同学赴苏联参观学习，然后趁机送孙多慈赴法国深造，但这一计划最后因被干扰而没有实现。

后来徐、孙二人不得不各奔东西，中间全靠徐的好朋友舒新城为他们传递信件。他们在信中互诉离别之苦。徐曾绘《燕燕于



30年代的徐悲鸿

飞图》赠孙，画面为一古装仙女，满面愁容，仰望着天上飞翔的小燕子出神，上题：“乙亥冬，写燕燕于飞，以遣胸怀。”表示了对孙依然是一往情深。孙则寄一粒红豆给徐，不着一字。徐见红豆触景生情，即以《红豆三首》为答：“灿烂朝霞血染红，关山间隔此心同。千言万语从何说，付与灵犀一点通。”“耿耿星河月在天，光芒北斗自高悬。几回凝望相思地，风送凄凉到客边。”“急雨狂风避不禁，放

舟弃棹匿亭阴。剥莲认识中心苦，独自沉沉味苦心。”

抗战爆发后，孙多慈一家辗转流徙到了长沙。徐悲鸿终于得以抽身出来到长沙与孙见面，并将孙的全家接到桂林，并为孙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职。这段时间大概是他们在一起最愉快的日子。他们常常一起去漓江写生，两人均创作了不少作品。几个月后，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了一则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，他们的朋友沈宜申拿着这张报纸去见孙的父亲，想极力促成徐、孙的婚事。谁知孙老先生竟坚决反对，带着全家离开了桂林，转往浙江丽水。一向软弱又内向的孙多慈在此关键时刻终于屈从于父亲，在丽水的一所中学任教。后来徐悲鸿应邀去印度讲学，一去四五年不归，直到1942年春才回国，而这时的孙多慈，已迫于父命嫁给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。许40多岁，正丧偶待续。徐悲鸿于次年认识了廖静文，后来娶廖为妻。

孙多慈在丽水时仍与徐悲鸿有书信往来，曾寄诗二首：“极

目孤帆远，无言上小楼。寒江沉落日，黄叶下深秋。风厉防侵体，云行乱入眸。不知天地外，更有几人愁。”“一片残阳柳万丝，秋风江上挂帆时。伤心家国无限恨，红树青山总不知。”

孙多慈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，30年代后期已名扬天下了。1936年中华书局为其出版了第一本素描集，第二年在安徽举办了个人画展，1949年在上海慈淑大楼又举办了个人画展。解放前她随丈夫去了台湾，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，50年代赴美国和法国进修，在台湾又举办过个人画展，受到极高的评价。

1953年9月，徐悲鸿在北京病逝。噩耗传到台湾时，蒋碧薇正去中山堂看画展。在展厅门口她刚签好名字，一抬头，正好孙多慈站在了她面前。这对几十年前的情敌，一时双方都愣住了。后来还是蒋碧薇先开了口，略事寒暄后就把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孙。孙闻之即刻脸色大变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她怎么也不会料到，蒋碧薇唯一的一次与她对话，竟是告诉她徐悲鸿的死讯！

70年代初，孙多慈患了乳腺癌，曾三次飞往美国做手术，最终医治无效，于1975年2月病逝于她的中大同学、至好吴健雄博士的家中，享年63岁。

战友情真假“孙冶方”

孙家有一后代名叫孙铃方，是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的学生。陈先生先后就任北京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。他得知孙铃方是寿州孙家的后人，便对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孙冶方的动人故事。

原来，真正的孙冶方原本也是孙家的后代，曾向陈岱孙先生问学。抗战爆发后，孙冶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。他有一个战友，名叫薛萼果，原先也是经济专业的大学生，是薛暮桥先生的堂房兄弟。他俩志趣相投，又有共同的理想，不久就

成为可以生死相托的一对战友。后来，在一次战斗中，孙冶方英勇牺牲了。他留下一篇未写完的经济学论文，寿州老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，平时靠他寄钱赡养。

薛萼果在极为悲痛之际，真正做到了继承烈士的遗志。他不仅按照孙冶方的思路，完成了那篇经济学论文，并以孙冶方的名字公开发表，还找出了孙的母亲地址，继续以孙冶方的名义给孙母寄钱，直到孙母去世为止。老人家至死也不知道儿子早已不在人世，寄钱人是位不是儿子却胜似儿子的陌生人。

有意思的是，孙冶方的那篇论文公开发表后，引起很大反响，有关人士到处寻找孙冶方。作为文章的最后完成者，薛萼果自然就得站出来承担责任，而如此一来，他也就成了事实上的“孙冶方”了。这个“孙冶方”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，人们只知道他在理论上的贡献，却鲜知他对待战友的深厚情谊。如今人们在《辞海》的“孙冶方”条目下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其原名应为“薛萼果”，江苏无锡人。

救困厄信义赛金币

1945年上半年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德国军队在东西两条战线都节节败退，眼看必败无疑。这引起了呆在上海的德国人的极大恐慌。

有一天，孙家方字辈老十孙沂方，来找他的九哥孙镇方，说是有两个德国人想请他帮个忙。孙沂方与孙镇方是同胞兄弟，均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。孙沂方还与孔令侃（孔祥熙的儿子）、盛毓卹（盛宣怀的孙子）、刘沂万（南浔“四象”之一的刘翰怡的儿子）等均为同窗，尤其与孔令侃最为投缘，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孔府做事，曾任孔祥熙的秘书。抗战中他没有去重庆，而孔家从重庆返沪后，仍然重用他，在孔家的扬子公司里任职，可见关



孙沂方（右一）、孙镇方（右二）、孙炽方（右四）和岑诚之

系非同一般。

孙沂方的妻子邝文英是宋美龄的秘书，广东人。邝的父亲叫邝福硕，与宋的父亲同道，都是有名的传教士，一般认为邝的父亲在教会内地位还高过宋的父亲，是中国传教士的总首领。或许就因这层关系，邝文英当了宋美龄的秘书。由此，她与外国人的接触自然就多了。这次孙沂方来找孙镇方帮忙，实为邝文英的德国朋友碰到了麻烦。

来者是当时德国在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公司之一“美最时”（另一是西门子）公司的老板。他从内部消息探知，德国很快就要宣布投降，而一旦投降，日本军阀就会视德国为敌人，那么在上海的德国人就会像英美人士一样遭到厄运。这个“美最时”老板是做好了进集中营的思想准备的，他只想请人帮他代管一下财产，而这个人必须与日伪有联系，才能确保安全。当时孙沂方的九哥孙镇方担任汪伪复兴银行的行长，还曾任周佛海的机要秘书。其人虽已“落水”，但对待亲戚朋友还是讲情义的，况且他

自己也是银行界人士，代人管理财产自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孙镇方果然一口应承。这个德国人要他代管的，除了巨额存款、票据、全套的德国家具外，还有一整盒德国各个时代铸造的金币，共17枚，极为名贵。孙镇方将其藏入银行保险柜。不久，随着德国宣布投降，在沪的德国人果真被日军投入了设在浦东的集中营，直到8月15日日本人也正式宣布投降后才放出来。

当孙镇方将代管的财产交还德国老板时，那德国人执意将那盒金币送给孙作为报酬。孙镇方不肯夺人之爱，又将其完璧归赵。那位德国老板前几年还在世，曾托来华的朋友转达对孙的问候。

然而抗战胜利后，孙沂方和孙镇方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孙沂方由于与孔家的关系，一路春风得意，还当上了国民党的行政院参事。孙镇方则作为汉奸先关押了几个月，后因与军统的关系而获释；随后又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，在潘扬系统从事地下工作，尤其是参与了策反邓葆光后，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。而这么一来，孙沂方在台湾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不久，“行政院”的差使也给“撸”了，叫他去管圆山大饭店，最后跑到美国当了寓公。而孙镇方的日子更不好过。50年代初还能往返沪港两地，到1955年潘扬冤案爆发后，他也成了“三千三案”中的一个，而且新账老账一起算，在白茅岭农场度过了整整18个年头。

闯香港再兴面粉厂

当年阜丰面粉厂的老麦仓主任，是孙家多字辈的一位老人，方字辈兄弟唤他“锦容大伯”。锦容大伯后来因经营上与经理孙仲立有矛盾，一气之下就甩袖不干了，带了一帮子弟兵另起炉灶，在离阜丰面粉厂不远的苏州河边，建立了一家信大面粉厂。

锦容大伯毕竟是老阜丰，办厂的一套他熟门熟路，于是，“信大”很快成了日产2000包面粉的厂子，在上海滩树起了自己的牌子。这个老太爷之所以敢于另立户头单干，除了有经验之外，他还有8个儿子，指望他们成为事业上的帮手。而事实上，真正的帮手只有老大和老二，其他几个都走了办银行的路子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解放前夕老四和老六到了香港，别的事业无可措置，两兄弟也只好回过头来吃面粉饭了，而且真的创出了大世面。

老大孙鸿方与其父一样，办事重信誉，经营上从不搞投机取巧，生活上也极其简朴。他们不在大马路上租写字间，而是在天津路租了幢石库门房子办公。中午，老太爷也与职工一起吃饭。开饭不用厨子，而是用“包饭作”，每桌2元钱的饭菜，大家吃饱算数。老大、老二是跟老爷子一起办厂的，厂里的经营实权自然落在他们手里，而下面几个弟弟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


李孔晔在香港面粉厂孙麟方铜像前

老四孙麟方是德国留学生，全副德国派头，喜欢打网球，还参加过市里的锦标赛，得过名次。在德国读书时就已买了汽车。回国后觉得两个哥哥把厂子办得不错，自己插不上手，就向大哥提出拿一笔钱去做生意，办了一家建业银行。可是大少爷初涉世事无经验，银

行总是亏损，到临解放时，总计已亏损45万美元，几乎脱不了身。好在堂弟孙镇方办过银行，也是网球场上的好手，孙麟方前去请教。孙镇方告诉他，对储户绝不能一走了之，可在报纸上刊一广告，请债权人到香港去清理债务；再者不能空手去香港，香港是广东人的市面，必须带上活命钱。孙麟方在上海虽然也有好地段的房产，但那时市面不好，有钱人纷纷逃命，大家都在抢着抛



孙麒方、李孔智夫妇

售房子，好房子也卖不出去。最后他总算带了5万美元到了香港。

1949年的香港市面也很乱。不少国民党大官和各地富户都蜂拥到了香港，一时还不能渡海到台湾，因台湾还不能容纳数百万军政人员及其家属，一般的商人就更没人管了。僧多粥少，市场有限，五克拉的金刚钻都卖不了几个钱，报上天天刊出有人破产跳海的消息，而从九龙到香港的轮渡码头上，几乎到处都是上海人。

香港人口的激增，反倒给孙家人带来了商机。人总要吃饭呀，过去香港人以吃米饭为主，面粉市场不大；而现在大批北方人流入，面粉就成了紧俏商品。孙麟方觉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他先是租下了一家小型面粉厂，从内地设法运麦子来加工。面粉

供不应求，于是干脆盘下了整个厂子再不断扩大。这个德国留学生此时也模仿起父亲和大哥的样子，一切从头做起，艰苦创业，终于时来运转，不仅香港人、台湾人买他的面粉，连朝鲜战争中的美国军方也向他订购面粉。他将面粉厂定名为香港面粉厂，产量可满足香港每天需求量的一半。几年下来，他不仅还清了在上海办银行的亏空，而且厂子越办越大，身价也迅速提高，还当了香港总商会的会长。英国港督鉴于他对香港经济作出的贡献，特向英国女王申报封了他一个爵位。60年代中后期，美国人在越南打仗，以香港为军需基地，孙麟方的面粉厂又一次大受其宠，使他一举成为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李嘉诚。孙家人不无感慨地说，他在上海有意办银行而久不得发，到了香港无意办面粉厂却成了大富翁，大概是天意吧。

麟方的弟弟老六叫麒方，圣约翰毕业后在金城银行唐寿明手下做事，解放前夕跟麟方去了香港。他们两兄弟加上孙家另一堂房兄弟，娶了寿州李氏三姐妹。三姐妹老大李孔晔嫁麟方，老二李孔智嫁麒方，老三李孔玮仍在上海。麒方夫人很能干，在香港创办了大东冷冻厂，从内地出口香港的冷冻食品，大都在其冷库存放，生意非常红火。可惜麒方后来脑中患病，不幸逝于手术台上。麟方由于劳累过度，1974年在香港总商会的一次讲演中，突发脑溢血而以身殉职。当时的香港政府为他塑造了半身铜像，安放在香港面粉厂。

孙氏兄弟逝世后，李氏两姐妹继续掌管家业，前些年将香港面粉厂换代的一套机器设备捐给了广东面粉厂。目前，老姐妹俩已定居美国，安度晚年，离港时把厂子卖了4亿港币。

嫁孔府情结同命人

解放前后，孙氏家族有一大批人移居海外；80年代以后，

随着更大的出国潮的兴起，孙家亦掀起了第二次移民潮。现在，两代移民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，总数恐怕已在千人以上。他们散居在英、美、法、加拿大、德国、日本等国，在香港、台湾等地区居住的亦不少，大多从事经济管理和技术工作，有的仍在经商做生意，但是距离面粉业似已很遥远了。



孔子 77 世孙孔德成与孙琪方结婚照

孙文正公的曾孙女孙琪方如今已是古稀老人，与丈夫孔德成（孔子第77代孙、世袭衍圣公爵号）在台湾安度晚年。1936年他们在“天下第一家”的孔府结婚时，曾是一件大新闻，各大报刊争相刊载他们的结婚照。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还赠送了“瑞应睢麟”匾额，以示庆贺。那时新郎官19岁，新娘子17岁。新郎官的姐姐孔德懋为新娘当伴娘，亲自把新媳妇迎进孔府大门，送到了弟弟身边。

孙琪方是孙家鼐的孙子孙多燿的女儿。其父早年曾任职财政部和中国实业银行，世居北京旧帘子胡同。孙家人至今还在传说琪方小姐嫁到孔府后的种种细节。据说孔府里墙高院深，规矩森严，每天行止都有规定，连上餐厅吃饭也须乘上轿子，由别人抬过去。她那时才17岁，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，乍一远离娘家嫁到此高墙深院之内，好像小鸟被关进了金丝笼，只能偷偷地以泪洗面。好在新郎官孔德成是个通情达理、心慈面善之人。他是个遗

腹子，出生仅17天，生母又去世了，只有姐姐孔德懋是最亲的亲人。姐姐出嫁之后，他就成了“孑余”之人，正需要亲情的慰藉。于是，两夫妻似有同命之感，虽是封建包办，婚后的生活倒也和美。

解放前夕，他们夫妇去了台湾。孔德成出任台湾考试院院长，又兼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。90年代，孔德成的姐姐孔德懋作为两岸文化交流代表团成员赴台访问时，孙琪方夫妇冒雨驱车前去宾馆会面。这是她近50年来第二次见到这位大姑姐姐，自是道不尽的人世沧桑，叙不完的骨肉之情。孔德成写给姐姐的诗中更表达了深沉的故乡之思：“黄昏北望路漫漫，骨肉相离泪不干。千里云山遮烟雾，搔首独听雁声寒。”“铜壶漏响三更幽，独对明月感旧游。何当再逢共话夜，晚雁声里惨对秋。”



孙氏家族实业界人士在沪合影（前排左二孙伯群、左三孙元方、中排左二孙观方、左三孙锡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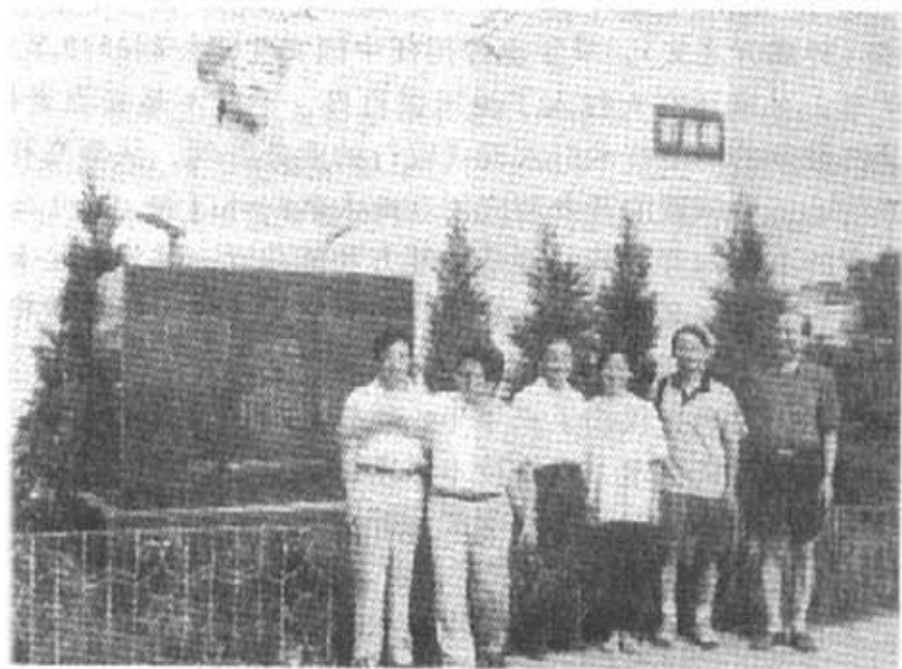
除孔德成之外，孙家的姑爷队伍中还有几个出名的人物。一是曾任中国银行总裁的李士伟，二是中国实业银行后期的总经理刘晦之，三是前清湖北九门提督张彪之子张学骥（即天津张园的主人），还有施肇基的弟弟施肇祥等等，均是民国史上风云一时的人

物。

新寿州依旧“孙半城”

寿州孙家既是“一门三进士，五子四登科”的书香人家，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自然视为顶要紧的事情。后代子孙确也争气，百年间实实在在地出了不少人才。除了上述那些在工商业界、政界、艺术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外，在教育界、科技界、工商管理界，尤其高科技领域，仍不乏孙家方字辈、以字辈和自字辈的专家学者。

孙家鼎的嫡曾孙孙珍方，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研究院的留学生，1949年回国投身革命，随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来到南昌，在江西日报社当了10年编辑，1963年调入江西师范学院（今江西师范大学）外语系从事英语教学。粉碎



孙良方（左三）在寿县第一中学的孙家鼎塑像前

“四人帮”以后担任了领导职务，晋升教授，还担任了江西省中学英语教学研究协会会长、江西省翻译系列高级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。



寿县水利局长孙以隍夫妇（右三、右一）、文化局副局长孙以安（左一）和作者

孙家在银行界的经理、襄理

有一大群，除了中孚银行的孙元方、孙观方、孙锡三、孙启方之外，还有任中国实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的孙瑞方、任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的孙绎方（羽侯）、任复兴银行行长的孙镇方、任国华银行苏州分行经理的孙炽方。多字辈中的孙燧多（孙琪方之父），早年也曾担任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多年。近年来，孙家还有人打入了美国银行界，不过不是去当老板，而是将最新的网络技术引入现代银行的业务管理，从事高科技的银行、证券领域的开发和应用。此人名叫孙以御，当年曾是吉林省的上海知青，其父母是孙绥方和陈苑青。其外公是上海化学工业界极有名气的实业家和收藏家陈器成先生，他曾将大批古物捐入上海博物馆。孙以御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考入长沙国防工大读书，仅读了一年半，就转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深造，学习计算机技术、网络技术。刚到美国时，靠打工维持学业和生活，电工、泥瓦工、木工、油漆工全做过。凭着好学进取、不怕吃苦的精神，他完成了学业。后来在著名的IBM公司任职，又在美国大通银行从事网络技术开发，现任美国花旗银行世界金融证券部的副总裁，是孙氏家族第二代移民中的佼佼者。

孙氏后裔中还出现了一批为中国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者。除了前述的孙一中烈士、孙冶方烈士外，还有曾担任中共第一任南京市委书记的孙津川烈士，现在南京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内，悬挂的第一幅照片即是他的遗像。至今健在的还有孙以瑾女士。孙以瑾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，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，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历任中共县、市委书记，驻越南经济副代表，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、全国人大代表。

在其他领域中作出突出成绩的，还有淮北矿务局高级工程师孙多晶、文字学和考古学家孙百明、著名电影导演孙敬、医学专家孙绵方等等。

此外，在古城寿州的孙氏后代中亦不乏人才。改革开放以来担任过寿县局级以上职务的领导人中，孙家占了10位，他们中有县人大副主任孙以敏，县政协主席、水利局长、治淮功臣孙以镠，文化广播局长孙以安等。而整个县城内外枝枝蔓蔓的孙家人口竟达30万人。

一个世纪以前，人们称孙家是“孙半城”；现在的孙家，依然门庭若市，更加辉煌。原中国科技大学的数学系教授孙良方，现已定居美国。十几年来他曾多次回国探亲，并先后3次捐资近百万元，在老家寿州建造了两所希望小学，又在寿州中学设立了奖学金。在工作之余，他还热心孙氏家谱的续修之事，目前正积极联络海内外的孙家子弟，收集材料，着手准备。他认为，上一次修孙氏家谱是在20世纪初，现在已进入21世纪了，10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孙氏家族也从古城寿州走向了世界，这段历史如不抓紧记载下来，那真要愧对祖先，也难以向后人交代了。